

云南民族文化



交流与互动研究

拉木·嘎土萨 主编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民族文化



交流与互动研究

拉木·嘎土萨 主编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南民族文化交流与互动研究 / 拉木·嘎土萨编.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222-15405-6

I. ①云… II. ①拉… III. ①民族地区 - 文化交流 -
研究 - 云南 IV. ①K28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3572号

责任编辑：张晓岚 杨 惠

装帧设计：昆明昊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校对：钟 静

责任印制：洪中丽

云南民族文化交流与互动研究

拉木·嘎土萨 主编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npph.com.cn
E-mail ynrms@sina.com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0.5
字数 200千
版次 2016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云南康龙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15405-6
定价 36.00元



云南人民出版社公众微信号

编委会名单

顾 问：李 涛 何祖坤 杨正权

主 编：拉木·嘎土萨

副主编：郭家骥 李金明

编 委：李永祥 王 俊

编 务：曹伟道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重点研究项目

— 目 录 —

云南周边跨境民族文化交流互动与边疆繁荣稳定.....	郭家骥	1
失语的边缘		
——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互动.....	拉木·嘎土萨	24
族群认同视野下的民族节日与社会互动		
——以云南新平县的民族节日为例.....	李永祥	32
中缅独龙族的文化互动交流及问题研究.....	李金明	40
茶马古道各民族商号经济互动关系.....	李旭	48
论城市化与散居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的互动		
——以昆明市民族乡、村为例.....	王俊	63
宁蒗翠玉乡多民族地区日常生活的人类学考察.....	王贤全	84
以少数民族节日的交流与互动传承民族文化		
——从新平磨皮花鼓舞濒临失传说起.....	刘婷	93
云南藏族生态文化.....	尹仑	102
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民族团结的路径		
——户撒阿昌族乡民族和睦团结的历史与现状.....	攸延春	111
巴珠的唱度锅庄舞与热巴舞调查报告.....	曹津永	120

跨境民族的领地意识与边民互动研究

——以怒江景颇族茶山人和傈僳族为例 刘镜净 129

易地扶贫搬迁中的民族文化变迁与互动

——以维西县扎木坪子移民搬迁为例 沙马阿青 146

从民俗看民族文化和经济的关系

——以少数民族婚俗为例 刘 兵 156

云南周边跨境民族文化交流互动 与边疆繁荣稳定

郭家骥

地处中国边疆，民族众多，与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接壤，与东南亚、南亚众多国家和民族地缘相近、毗邻而居、关系密切，是云南的基本省情之一。由这一基本省情所决定，云南与周边国家跨境民族的文化交流互动，就自然成为影响云南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建设的重要因素。

一、云南周边跨境民族概况

云南周边跨境民族居住的地区，大体上包括云南省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保山市、临沧市、普洱市等8个州市中的贡山、福贡、泸水、龙陵、腾冲、盈江、陇川、瑞丽、芒市、镇康、耿马、沧源、澜沧、西盟、孟连、江城、景洪、勐海、勐腊、金平、绿春、河口、麻栗坡、马关、富宁等25个县，面积92359平方公里。缅甸与云南的跨境民族地区主要包括缅甸的掸邦和克钦邦，面积24.8万平方公里。老挝与云南的跨境民族地区主要包括北部的丰沙里、南塔、乌多姆塞、琅勃拉邦、华播、川圹、波乔和沙耶武里等8省，面积12.3万平方公里。越南与云南的跨境民族地区主要包括越南西北部的河江、老街、莱州、山罗、宣光、安沛、永富等7个省，面积6.5万平方公里。总起来看，在这块面积约有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越南、缅甸、老挝4国毗邻地

区，居住着大约2500多万人。^①

从自然地理角度来认识这一地区，可将其视为一个有机连贯的整体和一个形貌相似的地理单元。从中国西南“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的高黎贡山和横断山脉的无量山向东南、向南延伸形成了中国云南和老挝、越南、缅甸的主要山脉；澜沧江—湄公河、独龙江—恩梅开江—伊洛瓦底江、怒江—萨尔温江、红河等多条河流，发源于中国、流经中国云南与东南亚陆地国家，也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主要河流。这些山脉和河流自然形成的河谷通道，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就自然成为不同族群交往流动的走廊，这些走廊就将这一地区的不同族群勾连成为一个整体，形成了难舍难分的历史关系。直到近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使国家边界清晰化以后，才形成了同一民族或亲缘民族跨境而居的现象。因此，跨境民族是指跨越国境、毗邻而居的同一民族或亲缘民族。云南与周边国家跨境而居的同一民族如景颇族、彝族、哈尼族、傈僳族、拉祜族、苗族、瑶族、佤族等民族，历史上就居住在同一个地区，后来由于国家边界的清晰化和民族迁徙等原因，形成了这些民族分别跨居两个甚至是多个国家的分布现状。云南与周边国家跨境而居的亲缘民族如中国的傣族、布依族、壮族等民族和境外的泰族、佬族、掸族、岱族等民族，他们有共同的族源关系，后因迁徙或国界变动等原因，其中的主要部分逐渐向不同的方向发展，文化上产生了明显的差异，对其是否还是同一民族，其成员和有关学者也形成了不同的看法。^②尽管如此，双方历史上的亲缘关系和现实中的密切联系却是大家公认的客观事实。

今天，中国云南与周边直接接壤的国家跨境民族分布情况是：壮族，跨中、越两国而居，在越南被称为岱依族和侬族；傣族，跨中、缅、老、越4国而居，在缅甸称为掸族，在越南、老挝被称为泰族；布依族，跨中、越两国而居；苗族，跨中、越、老、缅4国而居，在越南和老挝被称为赫蒙人；瑶族，跨中、缅、越、老4国而居；彝族，跨中、越、老3国而居，在越南和老挝被称为倮倮族；哈尼族，跨中、缅、越、老4国而居，在缅甸被称为么舍族；拉祜族，跨中、缅两国而居；景颇族，跨中、缅两国而居，在缅甸被称为克钦族；佤族，跨中、缅两国而居；德昂族，跨中、缅两国而居，在缅甸被称为崩龙族；布朗族，跨中、缅两国而居。^③

① 参见刘稚：《中国—东南亚跨界民族发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136页。

② 参见和少英等：《云南跨境民族文化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

③ 云南大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编：《云南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963—964页。

二、跨境民族文化交流互动及影响

在近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导致的国家边界清晰化之前，跨境民族的文化交流互动基本处于自发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国家政权对边疆经营的日益深入和与周边国家边界的清晰划定，云南与周边国家跨境民族的文化交流互动就脱离了原先的自发状态，越来越多地受到双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特别是其边疆政策的影响。这种政策影响首先表现在双方边民的跨国流动上，由这些流动人群所承载的文化就在流动中自然地互动和交流。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与周边国家的边民流动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即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云南边民大规模向周边国家单向流动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云南与周边国家边民双向流动阶段；21世纪以来，周边国家边民向云南单向流动阶段。^①不同阶段边民流动的原因和目的不同，由其所承载的文化交流互动的形式、内容、规模和相互影响自然也就各不相同。^②现阶段，在国家全方位开放政策和桥头堡战略推动下，云南与周边国家文化交流互动的内容和规模日益扩大，交往日趋频繁和活跃，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跨境民族婚姻交流

婚姻可以说是不同的个人、家庭、群体、民族之间最深层次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一般来说，正常的、频繁的、较大规模的通婚，通常都发生在个人和群体相互熟悉和了解的情况下，也就是说，人们倾向于在熟人之间缔结婚姻关系，而这里的所谓“熟人”，至少要是说着共同语言、具有同样生活方式的人。这样的人如果居住在不同的国家，就表明他们之间的文化交往已经到了很深的程度。云南边民与周边跨境民族都是同一民族或亲缘民族，历史上就有密切的联系，因而双方缔结婚姻关系古已有之绵延至今从未中断过。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云南边民与周边跨境民族之间的婚姻关系的出和进大体上是平衡的和正常的。进入21世纪之后，由于云南经济社会较快发展使边民生活有了较大改善，由于云南边境地区的妇女较多地嫁到中国内地，使边境地区的青年男女性别比失衡而对境外妇女形成了较大需求，当然也由于双方历史上就存在的密切的文化交流与互动等原因，^③使云南边境地区对周边跨境民族边民产生了强大

^① 何明：《开放、和谐与族群跨国互动——以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国家边民跨国流动为中心的讨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② 参阅马曜主编：《云南民族工作四十年》上册，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王连芳主编：《云南民族工作的实践和理论探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王连芳：《王连芳云南民族工作回忆录》，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郭家骥：《云南民族关系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③ 张金鹏、保跃平：《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跨境婚姻与社会稳定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的吸引力，在其推动下，云南边民与周边跨境民族的婚姻关系形成了境外妇女大量嫁入云南的“一边倒”趋势，且通婚地域从沿边境县向内地县（市）延伸，早期通婚边民的子女已延续到第二代、第三代。^①

据云南省民委的调查，截至2012年底，云南省25个边境县共有跨国婚姻37360对，绝大多数是境外妇女嫁过来。其中，缅甸人入境通婚25314人，占69.8%；越南人入境通婚5937人，占16.3%；老挝人入境通婚1123人，占3.1%，其他占10.8%。

周边国家跨境民族边民妇女大量嫁入云南这一趋势的形成和延续，表明中国和云南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当然主要表现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吸引，但更深层次的文化的吸引却为其提供了前提和保障。在对瑞丽姐告国门社区的调查中，原姐告村现恒茂村民小组的傣族群众对笔者说：

姐告是我们寨子的名字，没有搞国门之前，我们寨子与缅甸只隔着一条田埂，与缅甸人的关系非常密切，那边的人都是我们一样的民族，语言完全一样，所以，1958年中国乱搞斗争时，我们寨子的很多人家都跑到缅甸去了，只剩下很少的人家在这边。从古到今，我们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外来通婚的，因为分布在缅甸边境线上的都是我们同一个民族。比如我家，我大姐夫、三姐夫、二嫂、我的女婿、我的侄女婿等等，都是缅甸人，都是我们傣族，讲的话完全一样。我大姐是在中国混乱时期嫁过去的，姐告开发后，看着中国越来越好，两口子就带着孩子一起回来了。自从姐告开发以来，到我们村来上门的或嫁到我们村来的国内外人员已达200多人，其中从缅甸过来的就有100多人，从中国内地广东、四川、贵州、云南腾冲、保山、临沧、盈江、梁河、芒市过来的也有100多人，这说明我们这边好多了，如果我们不好，我们的人早跑到缅甸去了。

从傣族群众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这边生活好”亦即现实经济利益的吸引，是境外妇女嫁过来的直接动因，而“我们是一样的民族，语言完全一样”亦即深层的文化吸引力，则是境外妇女嫁过来的基本前提。

^① 李向春、袁春生：《加强云南边境地区跨国婚姻管理的对策建议》，载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云南省情民情调研及建言献策文集》第一集（内部资料）。

(二) 跨境民族劳务交流

跨境民族相互之间到对方的国家打工赚钱，表面上看起来是市场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实际上也是和双方的族缘文化纽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早在1984年，笔者在腾冲猴桥的黑泥塘村做田野调查时，就发现大批傈僳族群众悄悄出国去打工，一问才知道缅甸与我方黑泥塘村接壤的村寨居住的也都是傈僳族，历史上就是同一个寨子的人，他们那边活计多干不了，当然就会到我们这边来请工。30多年后的今天，跨境劳务交流的情况也是一样的。例如，据有关学者调查，在德宏、临沧的大部分德昂族村寨，都能看到过来打工的缅甸德昂族（缅甸称崩龙族）劳工。中缅德昂族人一向对本族人有特别的亲近感，加之生活习性相近、语言相通，在一起生活劳作方便，因此无论是找雇主，还是招雇工，首选的都是本族人。有的家庭本不需要雇工，而是看在同族和亲朋好友的情分上，收留外来者，也算是民族内部的一种互助。缅甸的德昂族民工大多是自己跑来找活干，索要工价不高，干活又卖力，很多家庭都乐意雇用他们。在瑞丽等一些富裕地方的德昂族村寨，来自境外的德昂族民工越来越多，他们不仅承担了寨子中的好多重体力活，有的甚至把日常农活都包干了。^①

如果说，跨境民族男性的劳务交流主要以外来为主、以从事传统农业等重体力劳务活动为主的话，那么，女性的劳务交流就是有出有进、以从事服务业为主了。据孟连县民宗局的调查，截至2010年12月，全县出境务工的有1249人，其中男性102人，女性1147人。女性出境，有的做生意，有的嫁给了国外的老板，但大多是在餐厅、歌舞厅做服务人员。^②国外入境务工的妇女也一样，从事的多是服务行业工作。2011年5月，笔者在瑞丽市调研时曾走访过一家由瑞丽农场的下岗职工开办的洗脚店，雇用的大多是来自缅甸的傣族人。一位来自缅甸佤城（曼德勒）的傣族妇女，用结结巴巴的汉语对笔者说：

我们店有10多个妇女都是缅甸佤城的，是我们在瑞丽的亲戚介绍过来的。在这里我每个月有固定收入300元，然后为客人按摩一次脚可提成10元，一个月下来多时可收入2000多元，少的也有1500多元，除去我的吃用，每个月我都能攒下900元钱寄回家去。我已结婚，有一个四岁的儿子，我很喜欢

^① 黄光成：《从德昂族个案看跨境民族的外来影响及其应对》，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云南智库《学术研究报告》总第15期。

^② 孟连县民宗局：《孟连县沿边跨境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及现状的调研报告》，载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云南民族工作调研报告集》（2011），内部资料。

佤城，也很想儿子，但是瑞丽这边挣钱比较容易，亲戚朋友也多，我也很喜欢。现在道路又好，通讯也方便，想儿子了随时可以打电话，想家了随时可以回去，平常没有事，我们每年都只是过泼水节的时候才回家去一次。

（三）跨境民族语言文字交流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基本特征，文字则是记录语言的工具。云南周边跨境民族由于社会发育程度不同，文化积累程度不同，其语言文字的发育和使用状况也各不相同。特别是近现代民族国家边界清晰化后，居住在不同国家的同一民族，其语言文字的发育和使用情况也出现了相当的差异，因而自然产生了跨境民族语言文字交流的需要。

例如德昂族。德昂族是人口主体在国外的跨境民族。中国的德昂族属于云南省特有的人口较少民族，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云南省有20188人，缅甸的德昂族人口说法不一，多的说有70万人以上，^①少的说有13万人，^②中间的说有25万人，^③不管怎么说，总之是缅甸的德昂族远远多于中国的德昂族。德昂族是源于古代百濮族群的民族，是现在分布区域的原住民族。德昂族有自己的语言，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德语支，历史上没有本民族文字，多使用汉文和傣文，过去曾有人借用傣文字母拼写德昂族语言，但使用范围不大。因此，创制本民族文字，一直以来就成为德昂族特别是拥有众多人口的缅甸德昂族的强烈愿望。

1972年，缅甸德昂（崩龙）族文学与文化委员会在缅甸南散政区正式成立，趁缅甸各地不同支系的德昂族代表人物聚首之机，在本民族有识之士和知识分子的积极倡导支持下，23位德高望重的德昂族僧侣和知识分子，依照德昂语的特点及语法结构，吸收全缅甸德昂族6个主要支系的语言，用巴利文与缅甸语文字的声母和韵母组合，创制了德昂文字。这套文字系统创立后，德昂族文学与文化委员会做了大量工作：确定其为全缅甸德昂族的唯一文字，进行大力的推广和应用；促成缅甸德昂族各支系全面认同这一文字并积极学习和使用；将最后确定创制文字的8月30日这一天，确定为全缅甸德昂族的盛大节日，每年都要举行隆重庆典。现在，全缅甸的德昂族知识分子大都已掌握了这种文字，并能熟练运用。还用它编制出版了《英、德昂语词典》《德昂史》《德昂语法》等书籍，开发出了电脑软件，德昂族艺术家运用这套新创文字创作

① 黄光成：《从德昂族个案看跨境民族的外来影响及其应对》。

② 和少英等：《云南跨境民族文化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2页。

③ 云南省民族文化艺术研究会：《桥头堡建设中跨境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及现状调研报告》，载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云南民族工作调研报告集》（2011），内部资料。

了流行歌曲，还被搬上舞台。

据调查，这套文字创制不久，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就有中国德昂族僧侣和一般群众到缅甸南坎等地学习，并将其传播到德宏、临沧等地区，仅陇川县的德昂族中就有100多人掌握了这套文字，他们还引进了缅甸开发的软件，可在电脑中广泛应用。在其他县市的德昂族聚居区，佛寺中的住持大佛爷或大和尚都懂得这套文字，他们或是去缅甸学习过，或是在缅甸德昂族人的帮助下自学而成，有的本身就是来自缅甸的德昂族僧侣。目前，这套文字已得到中国德昂族人的普遍认同，他们都为自己的民族有了自己的统一文字而兴奋，一些民族上层人士和知识精英正在积极学习，以便掌握之后向本民族同胞普及。^①

再如苗族。苗族是起源于中国大地上的一个古老民族，云南及其境外的苗族都是从中国内地迁来的。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字，苗族在云南已经是一个人口超过120万的大民族，越南的苗族约有80万，老挝的苗族有20多万，缅甸的苗族有1万多人，所以云南周边跨境而居的苗族不少。苗族历史上并无文字，19世纪20年代英国传教士柏格里在云南昭通地区传教期间，为当地苗族创制了一套用拉丁字母拼写的老苗文，主要用于传教。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语言文字工作者在老苗文的基础上，为苗族重新创制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新苗文，深受苗族群众的喜爱。遗憾的是，由于国内苗文人才的培养和苗文读物出版跟不上，苗文的普及推广成了一个大问题。不少苗族群众千里迢迢甚至是背着孩子到学校学习苗文，但学了以后用不上，几年后就全部还给老师了。

几乎与中国创制新苗文的时间相仿，20世纪50年代，一些西方传教士在老挝创制了苗文，利用苗文搜集、出版苗族民间故事、歌谣，记录苗族仪式、习俗，深得苗族群众欢迎，苗文迅速普及，并随着70年代中期大量老挝苗族难民移居西方国家而扎根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国外苗族不断到中国寻根访祖，国内外苗族的交往日益频繁，由于国外苗文出版读物多、影响大，因而云南的苗族纷纷放弃国内苗文而改学国外苗文，国外苗文在云南边境苗族地区得以迅速普及，影响日益扩大。^②

（四）跨境民族节日文化交流

泼水节是境内外傣族、德昂族、阿昌族等民族一年中最盛大的传统节日。早在20世纪80年代，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就正式将泼水节确定为法

^① 黄光成：《从德昂族个案看跨境民族的外来影响及其应对》。

^② 古文凤：《国际大通道建设中保障云南跨境民族文化安全的建议》，载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云南新时期发展建言献策文集》第85页，2011年内部资料。

定假日。近年来在政府主导下，泼水节已演变为辖区内各民族共同参与的重点节庆活动，参加节庆活动的国内外宾客和当地群众多达数万人。节日期间，中缅、中老、中泰双方跨境民族欢聚一堂，拜佛朝庙，探亲访友，跳舞唱歌，共度佳节，成为跨境民族广交朋友、睦邻友好和展示美好形象的一个重要平台。

目瑙纵歌节是境内外景颇族最盛大的民族传统节日，1983年即被德宏州确定为法定节日。景颇族聚居的陇川县，建起了规模宏大的目瑙广场，可容纳数万人。节日期间，景颇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从各村寨汇聚到竖立着“目瑙示栋”的广场，举行传统的祭祀仪式后，便唱起“哦然”，跳起“目瑙纵歌”，场面宏大壮观，歌声和舞步震撼人心。每年的目瑙纵歌节，缅甸克钦邦都要派出代表团参加，许多境外的景颇族群众也会自发前来参加。

从2000年开始，德宏州坚持每年举办一届专门增进两国边民友谊的“中缅胞波狂欢节”。节日紧紧围绕“和平、发展、吉祥、共欢”的主题，展示民族风情，重点突出狂欢，不仅以其浓郁的民族特色、异国情调和热烈狂欢的气氛给中外宾客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还推动了中国德宏、缅甸木姐地区的旅游、边贸、文化和社会的繁荣发展。自2006年第六届狂欢节开始，中缅双方还联合在节日期间举行中缅竹筏竞赛、瑞丽江“中缅友谊小姐”选美大赛、民族服饰、“珠宝小姐”评选赛、牛车彩车评选赛、彩车巡游、大象表演、民族弹弓、民族刀舞和民间体育竞技表演等活动。节日期间，成千上万两国边民云集瑞丽江畔，共同欢度自己的节日，呈现出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现在，这一节日及其文化活动，已成为增进中缅胞波情谊、弘扬跨境民族文化、促进两国经济文化交流和旅游合作，融国际性、民族性、参与性为一体的，在两国边民中有较大影响的节日。^①

花山节是境内外苗族同胞共同的历史悠久的盛大节日。一般从农历正月初三开始，要过3至5天，届时，要开展跳芦笙舞、爬花杆、演练武术、打陀螺、对唱民歌、斗牛比赛等活动。花山节在苗族聚居的地方都会举办，但规模和场面最大的要数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马关县。自2004年由县政府主导举办了规模盛大的花山节之后，花山节便成为马关县春节活动的重要内容和法定节日，节日期间，不仅县内的汉族、壮族、瑶族、彝族等族群众与苗族群众共同欢歌，国内贵州、湖南、广西等省（区）和越南、美国、法国、英国等国的苗族同胞都会来参与，成为跨境民族文化交流的盛会。

盘王节是瑶族传统节日。过节时首先要举行庄严的祭祀仪式，由德高望重的师

^① 和少英等：《云南跨境民族文化初探》，第254页。

公、道公念诵经文，之后才是群众性的歌舞活动。节日期间，老人还要向青少年讲述祖先备尝艰辛所创建的辉煌业绩，进行传统的伦理道德教育。红河州河口瑶族自治县举办过数次较大规模的盘王节，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瑶族群众和越南的瑶族参与，使之成为跨境民族文化交流的一个有效途径。^①

地处中国、老挝、越南三国交界处的普洱市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一眼望三国”的地方。随着中老、中越友好关系的不断加强，2009年10月，江县政府牵头举办了在哈尼族传统节日基础上倾力打造的“中、老、越三国丢包狂欢节”，节日期间，老挝、越南均派代表团来参加，节日举办的迎宾狂欢、丢包狂欢、牛体彩绘大赛、特色体育比赛、专场文艺演出、商品交易会、商贸洽谈会等活动，异彩纷呈，盛况空前。现在，“中、老、越三国丢包狂欢节”已成为三国睦邻友好的标志，三方已达成共识，今后将由三国轮流举办，对维护边疆繁荣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②

由德昂族“龙阳”神话传说而形成的龙阳节，更是典型地反映了跨境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和影响。龙阳的神话传说在缅甸德昂族中广为流传，说的是德昂族先民还没有诞生之前，在大地上有一个美丽的清水湖，湖的主人是一条青龙。一天，太阳公子变成一只大鸟从天上飞到湖边，发现这条龙后，想吃掉它。忽然，青龙变成一个美丽的姑娘坐在湖边的石头上休息，大鸟为之动情，自己也变成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到湖边与龙女嬉戏，双方情投意合，遂结为夫妻。不久大鸟不得不告别爱妻，返回自己的家乡，而龙女却怀了孕，在石头旁产下三个蛋，经太阳照射，孵化出三条小龙。小龙渐渐长大变成了人，他们追问自己的父亲是谁。母亲说，你们出山洞首先看到什么，什么就是你们的父亲。儿子们出山洞一眼就看见了冉冉升起的太阳，于是，太阳就被认作父亲，龙女便是母亲，这三条小龙就是德昂族的祖先，^③德昂族就是太阳和龙女的后代。为了表达对自己祖先的崇敬、爱戴和感恩之情，逐渐形成了龙阳节，德昂语叫“拉叮节”。^④

然而据有关学者对国内多个德昂族聚居区的实地调查和文献查阅，发现早期只有在陇川章凤一带的德昂族中流传着类似的神话传说，中国德昂族也没有过龙阳节的习惯，许多村民甚至未曾听说过这个节日，故多年来中国德昂族的法定节日确定的是泼

^① 云南省民族文化艺术研究会：《桥头堡建设中跨境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及现状调研报告》。

^② 普丽春：《桥头堡建设中云南跨境民族的文化交往与安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③ 类似的传说还有多种流传。参见黄光成：《德昂族文学简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53页。

^④ 林庆、李旭：《德昂族龙阳崇拜文化与民族国家认同》，《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水节。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境内外德昂族交流互动的日趋频繁，缅甸德昂族的龙阳节及其文化标志逐渐被认同和引进。前已述及，缅甸德昂（崩龙）族文字的创立受到缅甸德昂族社会各阶层的重视，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性的重要事件，在那23位缅甸德昂族知识分子和僧侣正式通过文字方案的地方建立了一座巍峨的龙阳雕塑塔，将德昂族文字勒石刻碑于塔的基座，并以英文、缅文和德昂文三种文字撰写：“1972年8月30日下午3点12分，在掸邦北部的Namkham镇Hpaden村召开的德昂族文学和文化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正式确定了德昂族文字方案，以立碑为志。”自此以后，“龙阳”元素成为德昂族的文化标志，在缅甸的德昂族聚居区纷纷建立了类似这龙阳塔式的建筑，并于20世纪90年代传入中国。云南省陇川县章凤镇户弄村委会的德昂族村寨，为了筹办一个德昂族传统节日，多次到缅甸考察学习，并请来缅甸德昂族师傅按照缅甸的模样造了一座龙阳塔，竣工时请来缅甸德昂族高僧举行了开光典礼，^①还在塔基的德昂族文字前面加中文说明：“为了弘扬德昂族民族文化，于公元一九九四年二月十九日将德昂族文字刻入标志碑”。1996年2月19日，在这座塔前举办了首届中国德昂族的龙阳节，邀请了潞西、瑞丽、盈江、梁河等县市以及缅甸的德昂族2000多人，再加上其他民族，规模很大，热烈隆重，盛况空前，大家都着盛装前来参加。节日庆典的布置和活动方式有不少是从缅甸德昂族那里学来的。人们在广场中央竖起一棵龙柱，龙柱下用竹、木围成一个大花篮，人们自发地采来鲜花、树叶装饰花篮，再浇上清泉水；来自各地的代表队轮番表演自己的精彩节目，青年男女编好花篮互赠交友；来宾们载歌载舞，尽情地唱歌、跳舞……从那以后，每三年都要举行一次庆典。龙阳节就此在中国德昂族人中“安家落户”了，从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跨境民族之间文化互动的脉搏和交流共振的节奏！^②

（五）跨境民族宗教文化交流

宗教本身就是文化，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核心组成部分，因此，跨境民族文化交流自然就免不了宗教文化交流。云南与周边跨境民族地区正处于“中华文化圈”与“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的边缘和交汇地带，是多种宗教信仰共存的地区，宗教文化多样性的特征十分明显。越南有一半以上的人民信奉大乘佛教，

^① 龙阳塔寄意龙神居住的宫殿，底座为四方形，分为四级，四面分别记载德昂族人1972年创制的32个声母和6个韵母，顶部为盘龙和太阳雕塑。龙的底座为茶叶和茶花，龙代表母亲，太阳代表父亲，茶叶代表茶农文化，茶花代表春暖花开的地方。龙体上部为金黄色，下部为浅蓝色，代表太阳照耀下的德昂族人希望和平、祥和美好。参见林庆、李旭：《德昂族龙阳崇拜文化与民族国家认同》。

^② 参见黄光成：《从德昂族个案看跨境民族的外来影响及其应对》，载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云南智库《学术研究报告》总第15期。

此外还有天主教、上座部佛教（小乘佛教）、儒教、道教、和好教、高台教等；老挝有50%的人民信奉上座部佛教，其余人信奉其本土的原始宗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缅甸有80%的人民信奉上座部佛教，此外还有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和本土原始宗教信仰。^①云南25个边境县的16个跨境民族中，傣族、布朗族、阿昌族和部分佤族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部分拉祜族、彝族信仰汉传佛教；部分瑶族、彝族信仰道教；部分傣族信仰伊斯兰教；部分傈僳族、彝族、苗族、拉祜族、景颇族、哈尼族、佤族、独龙族信仰基督教；部分怒族、傈僳族、苗族、景颇族、彝族信仰天主教。除世界五大宗教外，16个跨境民族还普遍信仰包括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乃至图腾崇拜在内的民族民间传统宗教。既是多元宗教并存又处于两大文化圈的边缘和交汇地带，使得这一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宗教文化交流历史上就非常密切，现实的宗教文化交流虽然有了国家的屏障，但民间交流仍然是活跃的，其中，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交流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明显。

据傣文手抄本《佛教大事记》记载，公元1296年，孟莱王征服了南奔、景栋，建立了以清迈为中心的统一国家，即兰纳王国，中国史书称其为“后八百大甸”。孟莱王的母亲是西双版纳第四代召片领（宣慰使）陶陇建仔的女儿。泰国《清迈纪年》亦有相应记载。兰纳与西双版纳的姻亲关系推动了双方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为南传佛教从泰国兰纳地区传入云南西双版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后，有大批巴利文佛经和注释被译成泰润文在傣族、掸族、老族地区流通，促成了这一地带佛教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傣文史籍《泐史》，还记载了明代缅甸金莲公主和西双版纳第二十五代召片领刀应勐联姻，缅甸国王派僧团携佛经及佛像到西双版纳传教的事件。新中国成立后，云南南传佛教界多次代表中国佛教界出访东南亚、南亚国家，同时也先后接待了多批来自泰国、缅甸、老挝、斯里兰卡等国佛教界的高僧大德和友好人士的来访交流。^②

但是，由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受“左”的思想影响，云南边境民族地区的宗教信仰遭到严重冲击，导致高素质的宗教僧侣出现严重断层；改革开放后云南边境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又加剧了宗教信仰的世俗化倾向，导致原本已经很少甚至稀缺的高素质宗教“僧才”纷纷还俗，使得云南边境民族地区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各民族，都出现了“有寺无僧”的问题。据调查，截至2010年，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共有正式登记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寺院592所，但只有18%的寺院有僧侣，82%的寺院均无

^① 王士录等著：《大湄公河次区域五国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3页。

^② 参见梁晓芬：《云南与东南亚南亚的南传佛教文化交流》，载《中国民族报》2013年11月12日。